

毕飞宇：小说家要带着问题去生活



9月19日下午，《毕飞宇短篇小说集》首发暨分享会在南京大学杜厦图书馆报告厅举行。在与主持人董子琪的对谈中，毕飞宇讲述了自己的短篇小说观，他的写作经历，以及与年轻人之间的代际差异。

扬子晚报/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



很烂，再新也没有用。”“所以我告诉我自己你必须得好好写。当你把作品写到一定的地步，任何时候出都是新的。”

在毕飞宇看来，相较于长篇小说、中篇小说，短篇小说有它的特殊性，它的写作门槛高，技术性更强。“我经常说，一个作家语言能力差一些，艺术能力差一些，一上手也可能会写出好的长篇小说。但是一个人如果一上手就能把短篇写好是很难的。”他做了个比喻，“踢一年的足球，能踢得有模有样；但打一年的乒乓球，可能打不出什么来，为什么？它太小。对手上的要求，包括你眼睛的刹那之间的分析与判断要求是极高的。”

写短篇小说是一个道理。“比方说一个长篇，你可以写30万字，笔力不够，写得拖拉一点，写50万字、80万字都可以，而短篇小说即使放开来写，写到2万多字以后，就不能再往上写了，你再往上写它就是中篇小说了。”

分享会上，毕飞宇讲了自己的一件“糗事”。2005年左右，他写完《平原》，计划写一组短篇小说，没想到一动笔就遭遇了“一场灾难”。“觉得开头写得差不多了，一看字数，已经15000。因为刚刚写完长篇，感觉还没发力，15000字下去了。”

2023年，写完《欢迎来到人间》后，他吸取了上次的教训，连续写了几个短篇，《打野》《阳台》《硬红冬烧饼店》等，发表在《收获》《人民文学》上。近两年的短篇小说，他计划在2027年收录出版。

二

在《毕飞宇短篇小说集》的附录，有一份毕飞宇短篇小说创作年表（1993~2025）。按这份年表依照时间次序阅读这部书，能看到他在近30年间的写作转变。

在分享会上，毕飞宇与主持嘉宾谈到了《写字》这篇早期作品。这是一篇讨论父子关系的小说。毕飞宇说，他出生于1964年，在1987年大学毕业，开始写作的时候，会回望过去的生活。而在1964年到1987年之间，中国发生了很多事，他会反思，为什么其中有些部分是如此的不正常。所以他“特别渴望”把这种“畸形”表达出来，“根本目的是要给我的读者看，或者更年轻的读者看，或者给未来看。”

在小说里，他写出了那种不正常年代里的复杂性。“为什么我的早期写作，反复去书写父子关系？因为父亲和儿子的关系，它首先是一个权力关系。父亲是个打猎的，想把儿子培养成一个猎手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父亲是

一个庄稼人，教儿子如何割麦子种水稻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我的问题是，真的是应该的吗？你真的有这个权利吗？”“换句话说，父权可以抗争，‘我’是可以脱离父权的。这个问题我们甚至可以从网络语言里面看到，年轻人用一种非常厌恶的口吻发明‘爹味’这个词。其实就是告诉你，你的味道是你的味道，我得争取自己的味道。”毕飞宇说，“没有人愿意被他人塑造。在那样一个好不容易从混乱局面中挣脱出来的年代，回望过去，写出《写字》这样的作品，那是必然的。”

而《生活在天上》这篇小说，则写于新世纪。此时，毕飞宇的写作重心已经发生转移。城市化和科技的发展给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，他开始反思“现代性”。所以在小说里，他安排一个很孝顺的儿子，把他的母亲带到了城里，住在小区顶层29楼。小说通过描绘私人轿车、高档电梯、摩天豪宅等现代都市的封闭空间，营造出初入都市者感觉仿佛“生活在天上”的异化感。

“作为一个小说家，你始终是带着问题去生活的，所以这一篇作品很自然而然就出现了。”毕飞宇说。

作为曾经的先锋小说作家，毕飞宇在分享会上也深度剖析了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作家的关系。“魔幻现实主义从哪儿来？当欧洲人的科技来到拉美，来到一个没有科技发展的地方去，认知的落差犹如炸弹一样。”在他看来，中国也曾经历过这种时刻，改革开放后，“整个世界迎面而来”“虽然中国没有诞生爆炸文学或魔幻现实主义，但是我们的心路历程是一样的，我们的作品当中多多少少也呈现出魔幻现实主义那样的局面”。

毕飞宇说，他看到2012年莫言的诺奖授奖词，是不高兴的。因为他觉得莫言继承了拉美文学的魔幻现实主义，如果“请我来写，我将会写：在东方开创了魔幻现实主义的第二战场，这是我们当代中国作家的一个骄傲，因为

我们有类似的文学美学特征，我们不能说没有受到拉美的影响，但即使没有，我们的作品当中也依然会有某些魔幻色彩。”

三

“小时候读到什么作品，打开了你写作的窗口？”主持嘉宾的这个问题是毕飞宇“最不能谈的”，因为这是他“人生永远的痛”。

毕飞宇回忆，在他成长的那个年代，只有毛泽东、鲁迅的著作，以及他父亲抄录的中国古典的唐诗、宋词、《古文观止》可以阅读。

毕飞宇的早年阅读史中，唐诗和宋词是他“人生里面最宝贵的第一桶金”，让他懂得语言的神奇与能量。“这是我内心第一颗文学的种子。所以我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，特别喜欢注重小说的意境”；而鲁迅著作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他反抗精神；西方文学的人道主义也在他内心刻下深深的印记。

和今天的孩子的阅读经历相比，两代之间“差别是巨大的”。而谈到代际差异，毕飞宇说，他们这一代人不是读书长大的，也不是看手机长大的，而是在“物理空间”里长大的，所以是三维的；而现在的孩子，是在大小屏幕的陪伴下长大的，“他感知世界和感知生活的方式是二维的”。三维世界走出来的人，浪漫精神相对较少，但有极强的现实感；而二维空间里成长起来的人，精神更加灵动，智商更加卓越。“我跟我儿子几乎不讨论未来。我们的生活环境可能跟他的环境都不一样。我不觉得在这个点上我们可以构成对话关系。”毕飞宇说。

“1987年，我开始写小说，决定做一个小说家，稿子一写出来就被退回来，但我从来都没绝望过。我的笔只要不停下来，你退我的稿子，你能退到哪一天？我在读大学的时候，最强烈的感觉是，只要健康允许，我就一定有未来。这和我自信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这是时代的福利。”毕飞宇说。

《喜乐会》：有情有义喜乐相会

继前作《当燃》收获市场与文坛双重反响、三次加印之后，周宏翔把目光投向中国式家庭幽深复杂的内部。近日，周宏翔新作《喜乐会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

《喜乐会》以山城重庆为底色，一桩离奇命案撕开生活平静的表象，将悬疑叙事、市井烟火、时代伦理熔铸一体。重庆与大连，一山一海两座城市互为镜像，牵系起丧夫的空乘黄梓彤与失独母亲叶永珍。本是婆媳的两个女人，在命运重创之下，挣脱世俗婆媳的对立叙事，缔结超越血缘的深厚情谊。小说直面丧

偶、失独、中年再婚、高龄再育、尘封家族秘辛等极具现实重量的议题，在个体悲欢之中叩问：当完整团圆不再可得，人该如何带着伤痛，重新寻得生活的出口？

小说抛出两组极具现实张力的生命命题：丧偶之后黄梓彤渴望再婚，失独之后叶永珍向往再育。当原有家庭秩序被死亡彻底打碎，女性要在周遭的质疑、世俗的评判之中，争取属于自己重启人生的权利。故事没有把重启写成简单的治愈童话，而是完整铺陈选择背后的挣扎、顾虑与代价。尤为难得的是，拒绝当下

网络流行的“断亲出走”式简单叙事，直面中国式家庭复杂的肌理。很多伤害源于家庭，但人与人之间的支撑与暖意，同样生发于家庭。体面，有时是温情的铠甲，有时也会变成伤人的利刃。

周宏翔在分享创作心路时坦言：“我一直在思考悲伤的时长到底底是多少。当亲人离去，到底多久，一个人才有资格往前走？社会好像有一套无形标尺，可悲伤本就没有统一标准答案。写这部小说，就是想写下人在失去之后，该如何自处，如何寻找属于自己的出口。”

扬子晚报/紫牛新闻记者 沈昭



赠书福利

扬子晚报B座西窗将为读者赠送一本《喜乐会》，想要参与的读者可在B座西窗公众号留言，留言点赞数最高的读者将获赠此书（请及时截图私信小编）。

活动截止2026年9月28日中午12时，期待您的精彩留言！

上期赠书结果：网友“华艺”获《宝玲》一本。